

# 要闻

# 梦开始的地方：学访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的浙江实践

## 壹：序章

5月11日，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粉墙黛瓦、曲径清幽。村民姜祖海开的“望溪”农家乐，笼在丝丝烟雨中，更添江南韵味。

“下姜村，梦开始的地方。”这句旅游宣传语，刻在了村里的显眼地方。今天的下姜村，“农家乐、民宿住，游人如织到下姜。”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庄，今年前五个月，接待游客超过8.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50%，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045元。

而就在15年前，下姜村也有一句歌谣：“土墙房，半年粮，有女不嫁下姜郎。”彼时，让下姜村远近闻名的是贫穷、是落后、是污染。

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4月24日。这一天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，乘车从淳安县城颠簸了60多公里的“搓板路”，又坐了半小时轮渡，再绕100多个盘山弯道辗转来到下姜村。

“当时，习总书记就给我们讲绿色发展理念，就是在我们下姜村，因为靠近千岛湖，习总书记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。”回忆起当年的场景，下姜村老支书姜银祥依然很兴奋。

如果说，2003年的下姜村是“两山论”的早期萌芽，那么，2005年的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则是“两山论”公认的发源地。

5月9日，记者走进余村的村级电影院，那里正在播放着一段小珍贵的影像资料：2005年8月15日，在余村村党支部的村委会会议室里，听到干部汇报说关矿山、水泥厂，村级经济与百姓收入出现下滑以后，习近平同志面容温和、语气果断，说出那段深远影响中国未来的话：“刚才你们讲了，下决心停掉一些矿山，这个都是高明之举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我们过去讲，既要绿水青山，又要金山银山，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……”

余村下决心关停了“全县规模最大的石灰石开采区”，十几年过去，当地恢复了竹海碧波、莫干胜景，靠绿水青山引来大批游客，实现了从“卖矿石”到“卖风景”的华丽转变。

此时，当年许多对“两山论”一知半解，甚至抱以怀疑态度的人，才由衷地为这份预见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。“两山论”直接为浙江走什么样的路、追求怎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，生态优势也成为推动浙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动力。

如今的余村，镌刻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巨石纪念碑立在村头，无声地述说着余村凤凰涅槃般的转型、嬗变。

但嬗变的岂止是余村！千百年来，钱塘江逶迤而行，在中国江南秀山丽水之地折成了一个“之”字。因水之折，浙江之名由此而来，奔腾不息的江水也因“之”随物赋形，在潮起潮落间孕育着、生发着革新的伟力。

而浙江的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，也许是更早触碰到浙江浙水的灵动，就在这革新的氛围中，像梦工场一样到处上演着奇幻与蝶变：在这里，传统种养渐成历史，当注入文创、休闲、养生等元素后，农业变得时尚、精致而又高效；在这里，农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，反倒成了市民竞相踏足的后花园，人们把乡村生活奉为潮流，视作梦想；在这里，农民也不再是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写照，而是拿着手机栽水果，穿着皮鞋种水稻，开着宝马办民宿，让人恍惚：这是市民还是农民？在这里，农业与旅游的界线在模糊，农村与城市的界线在模糊，农民与市民的界线同样在模糊。

而说起这些变化，浙江人总会不约而同地提起，曾经担任5年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。尽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已是十余年前的事了，但他的“三农”思想在浙江深深扎根、历久弥新。

这是中国梦、“三农”梦开始的地方。5月，沿着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的实践路径，记者来到浙江，学访中国“三农”的浙江答卷及其背后的脉络逻辑。

## 贰：初心

嘉兴南湖一隅，一艘小船静静停泊。97年前，这艘看上去不起眼的小船劈波斩浪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惊天动地的历程。

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，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专程嘉兴，重温初心。

初心是什么？90多年前，依靠农村革命，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历史上最广泛、最深刻的社会变革；40年前，发轫于小岗村的农村改革打开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大门；5年前，承载着从“富起来”到“强起来”的历史使命，中国梦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。

任务与时俱进，初心始终如磐。为人民谋幸福，为民族谋复兴，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诺言。

但是，历史的命题、时代的叩问一再提醒：中华民族要复兴，中国要回归世界之巅，“三农”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门槛，传统农业大国的伟大复兴，注定要从乡村出发。

乡村，必将再度成为泱泱大国——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党的十九大，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，无数沉寂在神州大地的村庄，振兴的梦想在孕育、在破壳、在生长……

先行路上振兴之途的浙江乡村，如熠熠闪耀的星光，照耀着中国无数平凡村庄振兴的旅程；而她自己，脚步也从未停歇。正在朝着习近平同志15年前亲自擘画的梦想奔跑，实景演绎着中国乡村振兴的盛大图景。

让我们沿着时间轴回到2002年，当年10月12日，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，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，在3个月时间里跑遍了11个地市。而所有议题中，他最关心的还是“三农”。

然而2002年的浙江，对下一步经济社会如何转型升级，如何看待“三农”问题还是有疑问的。当时，作为一个GDP全国排名第四的工业强省，有

人认为搞农业不如搞工业；有人甚至担心，以工农促农会拖慢工业发展速度、拉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、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。

对此，习近平同志态度非常明确。“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无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什么程度，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会变。”2003年1月13日，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到。

2005年5月21日，习近平同志在《农民日报》专访《习近平的“新三农”说》中，深刻论述了他对“三农”工作的认识，即：务必执政为民重“三农”，务必以人为本谋“三农”，务必统筹城乡兴“三农”，务必改革开放促“三农”，务必求真务实抓“三农”。

此前3个月，他在《务必执政为民重“三农”》中写道：“目前，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一千万美元，我省已接近三千万美元。工业化、城市化呈进一步加速的趋势，这既是一个有利于‘三农’问题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，也是一个容易忽视‘三农’利益、导致各种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。”

今天听来，这是多么熟悉的话语，多么睿智的论断！但对当时的浙江，这无异是当头棒喝，是一种发展观的革命，是重农强农富农的宣言！尽管时光荏苒，但习近平同志的这一“三农”新思想，一直指引着浙江“三农”蹄疾步稳。自此，在浙江，无论是沿海，还是平原，或是山区，“三农”始终是重中之重，是精力、财力重点关注和扶持的对象，而这，不能不说与习近平同志当年的率先垂范密切相关。

在浙江抓“三农”工作，习近平同志不仅有理论，更有实践：不仅跟中高级干部讲，还一竿子插到底，直接向基层干部宣讲，把“三农”工作做得既高屋建瓴又落实落地。嘉兴市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72岁的村民陈新祖至今还记得2006年1月4日的情景。“习总书记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好站在门边，他走过来第一个就和我握手。”陈新祖说。

不过，陈新祖怎么也不会料到当天下午发生的事：习近平同志就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向海盐县160多位村党支部书记和县、乡镇负责人作专题宣讲。时任于城镇党委书记金爱明当时的第一反应是：“这可不得了了，省委书记给村支书开会讲新农村建设”。

今天，沿着草蛇灰线回到过去，我们恍然大悟，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着眼于古老民族“两个百年”复兴征程的雄图伟略就在思考、探索。

而这，不能不提到著名的“八八战略”。2003年7月10日，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，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指引浙江未来改革发展的“八八战略”。

关于“八八战略”，习近平同志曾这样阐述：第一个“八”所指的“八个优势”，并非单纯指已经体现出来的优势，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结合实际作出的总体把握，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。第二个“八”则是指八个方面的举措，是针对进一步发挥、培育和转化优势再提出的，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创新优势、再上新台阶。

“八八战略”体现了“经济优等生”的浙江对自己未来方向的思考与探索，更体现了决策者对发展大局的责任与担当。

“八八战略”核心要义离不开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方略。谈及“八八战略”，习近平同志不止一次讲到，浙江改革开放以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很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始终重视“三农”问题，不脱离农业抓工业化，不脱离“三农”抓城市化。

从“八八战略”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揽全局、纲举目张的宏图大略，成为小到一个省、大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。

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认为，浙江这些年的改革发展，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指引的结果，浙江今后的发展，也必须深学笃用，争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排头兵。

承接“八八战略”，对应乡村振兴。省长袁家军表示，浙江将从更深层次、更宽领域对待“三农”问题，认识乡村振兴，从全方位来统筹谋划、协调推进。

“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、创建生态省、推动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发展三大举措，这对浙江的‘三农’发展，可谓是一发而冲天！”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说。这位分管“三农”的副省长，是农田水利科班出身，此前长期在水利、海洋渔业等部门工作，他说，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提出，正式开启了浙江“以工农促农、以城带乡”的新阶段。

从西子湖到中南海，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日新益盛、臻至升华。

2013年12月，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：中国要强，农业必须强；中国要美，农村必须美；中国要富，农民必须富。

2015年7月，在吉林调研时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、不能忘记农民、不能淡漠农村。

2016年4月，在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，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，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。2017年10月18日，在党的十九大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，习近平同志再一次强调：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，必须始终把解决好‘三农’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。”

“三个必须”“三个不能”“三个坚定不移”成为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最为鲜明也最为系统的总括性要求；而“三农”的重中之重地位，则从《之江新语》到十九大报告，都是始终如一的坚守、始终不变的初心。

## 叁：融农

“呜—呜—呜—”在安吉县鲁家村，每天早上9点，村里的观光小火车都会迎着清晨的阳光准

时出发。村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听到小火车汽笛声响起。火车一响，“黄金万两”：游客来了，收入就来了。

鲁家村曾经平凡得不能再平凡，一没产业，二没名胜古迹，三也谈不上区位优势，2011年还是泥巴路、土坯房，村民收入靠养猪、养鸡，污染不小，利润却不高。

2011年，被称为“PPT书记”的朱仁斌当选村党支部书记，上任伊始，他就请专业机构为村庄做规划，然后拿着规划的“PPT”招商引资。在经过反复论证后，他带领鲁家村走上了“家庭农场+乡村旅游”的发展道路，如今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600元。

在诸暨市的山下湖镇，从一产的特色蔬果种植，到二产的火龙果精深加工，再到三产的休闲旅游、教育培训、文化创意等，一家名为“米果果小镇”的农场，有着农业版“迪士尼乐园”之称，每到节假日，人头攒动，车水马龙。

农场所在的解放村，过去一直以水稻种植和鱼塘养殖为主。而现在，工商资本带来了资金、技术、人气，关键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模式。“简单种种养养，已很难吊住消费者胃口，需要通过拉长产业链，来获得更高效益、更快发展。”“本土老板”陈照米说。

现在，传统农业得到改造，村党支部书记虞国新说，老百姓不仅有租金、有分红，还能在家门口就业。

在浙江，像鲁家村、“米果果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林健东认为，当传统农业与加工、采摘、养生、旅游、文创等结合后，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新业态，让农业身价倍增、脱胎换骨，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农业。

记者发现，浙江三产融合风生水起，消费市场和前景固然是前提，但政府的支持与保护，同样功不可没。甚至可以说，正是政府持之以恒抓基础设施，坚持不懈扶持政策，才为三产融合铺平了道路。

这一点，浙江省里的态度很明确：农业是安天下、稳人心的产业，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；但同时，农业毕竟属于市场经济，首先得有钱赚。浙江本身人多地少，农业产业又普遍多小散，靠规模、靠产量显然难以取胜，必须另辟蹊径，创立独特的竞争优势，方可占有一席之地。

面对严峻挑战，2003年，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，发展高效生态农业，并且明确将休闲农业、观赏渔业、森林旅游等业态，列为新兴产业予以扶持，并指出“所谓高效，就是要体现发展农业能够使农民致富的要求；所谓生态，就是要体现农业既能提供绿色安全农产品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”。

“在内涵上，高效体现的是产业致富，生态则体现的是，既要提供绿色安全的农产品，又要可持续发展。这一目标的提出，符合浙江资源禀赋的实际，也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。”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唐冬涛谈起习总书记指示精神时，深感受益匪浅。

三产融合，农业是基础，浙江将目光聚焦基础设施。

过去，浙江也有一些农业园区，但都是示范性质，数量和辐射面十分有限。2010年开始，浙江在习近平同志绘就的蓝图上，将“粮食生产功能区”和“现代农业园区”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现代农业的主战场、主平台和主抓手，既扎紧粮食生产的篱笆，同时借此推动现代农业发展。

“事实证明，浙江持之以恒抓‘两区’建设，这条路子走对了！一下解决了以往经营主体、产业布局、工作力量、资金使用散乱的弊病，实现‘一个池子蓄水’，为政府统抓农业，主体发展产业，搭建了绝佳平台。”林健东告诉记者。

余杭地处杭州近郊，区位优势显著，很早就打出了培育农业园区的口号。农业局局长丁少华深有感触地说，目前余杭建成了133个500亩以上的现代农业园区，如今它们大多成了三产融合的最佳平台。

2015年，浙江又在“两区”基础上，推出“农业产业集聚区”和“现代特色农业强镇”，直接聚焦三产融合。现在，全产业链几乎都为浙江农业的骨髓，也成为众多经营主体“不二法则”。

靠花卉苗木、种子种苗起家的浙江“森禾”，早已将触角伸至生态修复、城市绿化、园林设计等服务业，就连往常地方性的一些产品研发基地也变身花海。

义乌的“资深屠农”朱佺军，一改传统方式，让猪圈立体化，建起了六层高的现代化猪舍，自动喂料、自动清粪，还可进行无臭化处理，以养殖为基础，一条集加工、包装、储运等的“中央厨房”链条雏形出现。

被誉为“中国淘宝第一村”的临安市白牛村，村民们靠着一台电脑、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电子商务创业之路。2017年通过电商销售山核桃400多万斤，销售额3亿多元。

这几年，浙江的农家乐、民宿早已迈过“小打小闹”的阶段，进入到全面发展的乡村旅游时代。目前，从省里到市、县都在规划和推介“乡村旅游线路”，串点成线，为游客提供便利，还将农家乐、民宿、乡村旅游，列入政府采购目录和农会疗养休养等，鼓励其发展。像杭州、长兴，几乎月月都有农事节庆活动，帮助聚人气、打品牌。在湖州，乡村酒店、高端民宿、农家乐、农庄，对应各类消费，提供了多元选择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17年，浙江已建成4598个休闲观光农业园区，接待游客2亿多人次，实现总产值352亿元。

在唐冬寿看来，通过融合发展，浙江农业的地位得以夯实，影响力得以扩大，同时也走出了浙江独特的发展道路。

浙江的乡村旅游部门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尽管农业一产在浙江仅占GDP不足4%，农产品加工业也不占优势，但按照三产融合发展的口径计算，涉农产业所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超过了10%。

15年来，浙江审时度势，扬长避短，更注重品质品牌，更注重产业链的融合，一以贯之，接力奋斗，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任接着一任干，毫不动摇地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之路。成绩可圈

可点，经验弥足珍贵。2011年，习近平同志曾对《农民日报》总结浙江现代农业发展经验的报道予以批示：浙江在农业发展理念、农业经营主体、农业生产要素重组、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，符合浙江农业资源实际，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规律，对推动浙江现代农业发展产生明显效果，对浙江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好做法，可认真总结，积极推广。

## 肆：和美

5月江南，天青欲雨。

今年2月刚履新金华市委书记的陈龙，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，如何根据金华市的资源禀赋、历史文化、经济发展特色，在激烈的“美丽乡村”竞争格局中，彰显自己的个性，突出差异化优势。

陈龙此前长期从事“三农”工作，在与省内丽水、湖州、杭州、宁波等地进行了全面对比和分析后，他提出了“和美乡村”的定位。

“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内涵不一，要求更高，注重内在美、全域美、全面美，是美丽乡村的升级版，将作为金华实施乡村振兴的总载体。”让陈龙感到有基础的是，十多年来，通过狠抓配套设施和综合发展，金华乡村的“颜值”和产值都在不断提升。

在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金溪村，记者看见一座粉墙画壁、修竹芊芊的院落，远远望去还以为是私人别墅。走近才发现，居然是一座猪场。猪场老板倪洪报告诉记者，猪场存栏500头生猪，配套设施沼气池、干湿分离机、污水处理设施等，真正做到了零排放。

和美乡村也好，美丽乡村也罢，说的都是如何美上更美，美上加和，但如果没有15年前的“千万工程”，哪里有今天和美乡村与美丽乡村的竞争或升级？

时光回转到本世纪初。彼时的浙江农村，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，群众鄙瑜，走在浙江农村，要走过许多垃圾村才能找到一个干净的村。

城与乡，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体。城乡关系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对关系。2004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同志就提出，“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”。

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，如何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，是一个重要课题。发轫于2003年的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示范。

时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、被习近平同志称为“省级农民”的顾益康回忆说，有一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，看到一个村环境很好。习近平同志问，这样的村在浙江多不多？

顾益康如实告知：不多。据省农办摸排，当时浙江仅有4000个村村庄环境较好，剩余的3万多个村庄普遍较差。

差到啥程度？像经济最发达的杭州、绍兴等地，农民有了钱，纷纷盖起小别墅，可家里现代化、屋外脏乱差，垃圾靠风吹，污水靠蒸发，河里满是垃圾和黑水，农民连洗拖把都嫌脏。

习近平同志一路听，一路看，一路思考。2003年6月，一项名为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的工程，在浙江拉开帷幕。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：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，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，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。

想致富，先修路。2003年，浙江启动实施乡村康庄工程，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通乡通村及农村联网公路，公里数平均年增长30%。

那5年里，从通村公路，到村内的道路硬化，从垃圾收集，到卫生改厕，从河沟清淤，再到村庄绿化，“千万工程”就像大合唱，全面彻底解决村庄环境卫生。习近平同志亲自抓，亲自部署，每年召开现场会，为了鼓励各地创新争优，会议地点下放到县，哪里做得好，就在哪里开。《农民日报》2005年11月21日曾在头版头条位置，以《习近平书记和他的三次现场会》为题进行了报道。

“从省里到地县，再到县里，都是一把手‘抓千万工程’，这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惯例。尽管每年布置的工作有所侧重，但一直以来，决心不变、主题不变，5年便完成了初步目标。”顾益康回忆说，起初，对“一把手”亲自抓，许多人也不解，可正是由于这股恒心和魄力，让浙江农村环境整治形成破竹之势。

5年结束，“千万工程”并未就此止步，而是进入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，将整治内容拓展到生活污水、畜禽粪便、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治理，以及农房改造建设，之后浙江又启动农村垃圾分类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等一系列后续工程。

如今，“千万工程”在浙江大地结出累累硕果，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。截至2017年底，浙江省累计约2.7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设，占浙江省建制村总数的97%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处理，建制村全覆盖，11475个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处理，占比41%；90%的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。

对应乡村振兴总体要求，前不久，浙江出台了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》，将实施“万家新型农业主体提升、万个景区村庄创建、万家文化礼堂引领、万村善治示范、万元农民收入新增”的“五万工程”。“千万工程”在其发源地有了升级版。曾经境内皆是“黑水河”“牛奶河”的浦江县，如今河水清澈，野生鱼儿又多了起来。县委书记施振强感慨良多：“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深入人心，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人居环境改善的好处，再也不会回到了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的老路上了。”

嘉兴市早在2003年，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“城乡一体化”的概念，并在全省率先制订规划纲要，联动推进“城乡空间布局、基础设施、产业发展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”等六方面的一体

化。这些年来，嘉兴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保持全省最低。嘉兴的城乡统筹除了注重环境打造外，还格外注重以人为本。在嘉兴市副市长洪鹏鹏看来，城乡一体化就要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让老百姓享受优质的教育、卫生、文化服务。

作为“东南形胜，江吴都会”的杭州，一直不缺游客，但是杭州市副市长王宏告诉记者：“如今的杭州，每年1.6亿游客中，有1/3到过杭州的乡村，这股潮流已势不可挡。”他表示，杭州要顺应乡村生活成为一种向往和时尚的潮流，“把乡村打造成城市的大花园、大景区。”

“乡村旅游的发展，为浙江的新农村建设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，也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大新亮点。”彭佳学说。数据显示，去年浙江仅农家乐接待游客就达到3.4亿人次，总收入超过353亿元，“未来三年内，浙江将打造1万个A级乡村景区，其中，1000个还将达到3A级标准。”

最近，浙江更是启动了投资1.25万亿元的全省大花园建设，目标是要形成“一户一处景、一村一幅画、一镇一天地、一城一风光”的全域大美格局，建设现代版的“富春山居图”。这是浙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手笔，也必将为浙江的“三农”和乡村振兴带来巨大机遇。

如今，行走在浙江大地上，记者愈发强烈地感受到，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。公路、邮政、宽带、客运班车“村村通”，广播电视“村村响”，农村用电“户户通、城乡同价”……总之，村庄整治建设的点定在哪里，相关部门的项目和资金配套就跟到哪里。

与金华市委书记陈龙思考相契合的是，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已经超越了环境整治阶段。乡村的“美丽”，内涵更深，层次更高，范围更广；不仅有物质，也有精神；不仅有“颜值”，更有品味；不仅有富裕，还有祥和。

乡村文化繁荣起来，让老百姓“心有所栖”。“一个村庄得有一个文化中心，不然精气神就散了。”淳安县委副书记董文吉说。2013年，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“农村文化礼堂”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，唤醒沉潜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，接续起绵延于历史时空的江南文脉。如今在浙江，农村文化礼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，也是村民笑声最多的地方。截至2017年年底，已有7916个农村文化礼堂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，成为永不谢幕的村庄客厅。

基层党建强起来，引领着乡村同心同向，雁行有序。5月11日，在浦江县浦阳街道同乐村，青砖小瓦马头墙，红花绿柳芳草茵。走过每一户村民门前，都能看到标有编号的分类垃圾桶，村里看不到一处乱堆的垃圾。

“起初，我们村干部入户宣传监督垃圾分类时，村民们不理解，效果并不好。”浦江县浦阳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炜说，2013年开始，浦阳街道根据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，每名党员干部包干联系10户以上农户，每只垃圾桶对应有编号，将联系户垃圾分类情况纳入干部的日常量化考核，并以“红黑榜”形式进行公布。“党风正，民风淳，党员的面貌改善了，村庄的精神面貌才能焕然一新。”陈炜说。

乡村治理模式完善起来，构建起乡村格局的龙骨。而作为“三治合一”的探索地，嘉兴市桐乡市高桥镇岳风村早在2013年，就开始探索构建“法治、德治、自治”基层社会治理模式。“起初我们想单独搞法治、德治、自治的试点，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发现，三治‘分开搞不搞得开’。高桥镇党委副书记徐晓叶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桐乡逐步形成了“大事一起干、好坏大家判、事事有人管”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
2017年10月18日，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，村民早早聚集到村委大院电视机旁，当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说出“要建立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”，村民们顿时激动起来：“总书记说三治合一了！”

我们当然不好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“三治合一”一起起源于岳风村，但岳风村的实践是习近平“三农”思想在浙江根植心结出的硕果，则是毫无疑问的。

## 伍：创客

“最忆门前镜湖水”。5月11日，浦江县前吴乡，清澈湖水缓缓流淌。沿着湖边的木栈道一字排开的高端民宿就有13家，大长条桌临湖而置，家人朋友在此，喝上一杯龙井，尝一下当地特色小吃，弥漫着优美的湖滨慢生活情调。

说起民宿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就是名字比农家乐好听点，接待水平差不多，但在浙江，这样的观念已经过去时。

前吴乡民宿主人大部分都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。“他们懂得城市消费需求，善于推广和营销，又有品味，懂得创新，对于业态的引领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浙江省农办综合调研处副调研员侯伟说。

如今，前吴乡的民宿一到节假日，常常一房难求，浦江县长丁政告诉记者：浦江旅游收入从17亿元增加到92亿元，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。不光是民宿，传统农业也有不少新面孔。孙灵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，2014年放弃高薪职位回到老家永康市干起了农业。现在，藏红基地占地500多亩，还带动了周边186名农户。

而现在，像孙灵娟这样高学历，具有新思维、新技术，敢闯敢拼的新农人，在浙江被称为“农创客”，他们活跃在之江大地上，为浙江“三农”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。目前，浙江“农创客”已超过1600多名，其中80后占88%，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%。义乌市副市长董士虎认为，这些年轻的“农创客”，用生动的实践赋予浙江现代农业一种蓬勃的朝气，催生出生许多可歌可泣的农创故事。（下转 3版）